

# 抨击封建教会的战斗檄文

——评卜迦丘的《十日谈》

蔡先保

乔万尼·卜迦丘(1313—1375)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在他一生中创作了不少歌颂爱情的长篇诗歌和小说，而在一三五〇至一三五三年期间问世的《十日谈》，便是他的代表作。在这部不朽的宏篇巨制里所反映的主题思想，十分典型地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

这部作品采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艺术地再现了十四世纪意大利的社会生活情景。作者描写一三四八年，意大利最繁华的城市佛罗伦斯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瘟疫，人畜大批大批地死去。这时，城里的十个青年男女为了躲避这场可怕的灾难，一起逃到了乡下，住在一所美丽而幽静的庄园里。他们为了排忧解闷，除了欢宴歌舞之外，还商定着轮流讲故事。每人每天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一共讲了十天，总共一百个故事。所以，这部书就叫做《十日谈》。

在这一百个故事里，作者以深刻隽永的艺术笔触，精湛的文学语言，刻划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剖析了纷纭复杂的社会关系。故事的主人公有国王和贵族、法官和巡警、骑士和商人、僧侣和神父、海盗和小偷、公主和贵妇；同时，也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奴仆、厨子和马夫、羊毛纺织工和泥水工匠等。这些人物在

作者的笔下，一个个被表现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读者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宽广的、丰富多姿的意大利市民生活的风俗画。

这些故事虽然大多取材于历史事件、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和中世纪民间早已广泛流传的趣闻轶事，但是，卜迦丘在这些故事里却注入了新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内容，深深打上了新时代的印记，因而具有更现实的社会意义。正如茅盾说的“这些辛辣而幽默的小故事带着一个轰天动地的人类文化史上未曾有的大运动”。<sup>①</sup>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曾经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sup>②</sup>《十日谈》的社会意义，首先就在于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上，向中世纪封建教会所宣扬的禁欲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各种宗教伦理观念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它是文艺复兴早期运动中抨击封建权贵和反动教会一篇最有力的战斗檄文。

列宁曾经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于《十日谈》这部文学作品的分析也同样要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只有对六个世纪以前，即《十日谈》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才能发掘这部著作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基督教会已经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它与封建王权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基督教的卫道者们极力宣传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的荒谬理论，说什么人类自从他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之后，就犯了“原始罪孽”，从此，失去了美好的天国。亚当、夏娃的原罪又传给了后世子孙。因此，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烦恼与苦难场所”。人们只有禁欲苦行，才能得到上帝的“赦罪”与“拯救”，重新回到天国。说穿了，就是要人们对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采取绝对容忍和顺从的态度，不能有任何忤逆的行为。当时，罗马教廷是天主教的领导中心，它控制着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并且广泛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所以，意大利的反动势力就显得特别顽固和强大。

十四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已经在佛罗伦斯和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城市里可以看到，但是，这些新兴城市仍旧处于封建势力的包围之中。新兴资产阶级为了给资本积累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了扩张他们的势力，就必须摧毁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顽固堡垒——封建教会，荡涤宗教信条以及其它封建陈腐观念，把人们从上帝和神权的淫威之下解脱出来。这在当时来说，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是有进步意义的。

诚然，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地区，但是，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内仍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弱小。封建教会对于人文主义者是十分仇视的。人文主义者只要对教会所宣扬的神权政治和宗教信条稍有不满，他们就会以“异端”的罪名受到“宗教裁判所”的残酷迫害。有的被流放，有的受监禁，有的被火刑烧死。他们的著作不是被列为禁书，就是被焚毁。在这种敌对阶级壁垒森严的险恶形势下，敢不敢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封建制度和基督教会，这对早期人文主义者来说，的

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卜迦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在他的著作中，勇敢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树起了一面反封建、反教会的鲜明旗帜。这在他的代表作《十日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文主义思想在这部著作里完全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从这点过来看，他比同时代的人文主义作家更前进了一大步。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彼特拉克虽然热爱生活和自然、赞美人间的爱情和荣誉，但是，他还不能从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以及宗教传统的精神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他有时为自己追求“凡人的幸福”——爱情与荣誉而感到不安，并企图忏悔。这种反映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两个时代的深刻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含蕴在他的抒情诗中。

卜迦丘却不同，他没有彼特拉克那种因中世纪的幽灵压迫心灵而造成的矛盾与痛苦，他勇敢地冲破了宗教思想的樊篱，用他那只锋利如刀刃的笔，对教会的种种罪恶予以无情的揭露，对僧侣阶级的腐朽堕落予以有力的鞭笞，对反动宗教神学予以严正的批判。在《十日谈》的第一天第二个故事里，卜迦丘把抨击的矛头就直接指向天主教的最高领导中心——罗马教廷作者通过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犹太人对罗马教廷的生活情景以及对教皇、红衣主教、主教的恶行败德进行查访的故事，尖锐地指出他们从上到下，都是一些只知道好色奸淫的寡廉鲜耻之徒，爱钱如命，贪婪无厌的酒囊饭袋之辈；并指出教皇的驻地罗马已经“不是一个神圣的京城，而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大洪炉！”这里，尽管作者对罗马教廷的腐败情景和教会统治者的丑恶嘴脸勾划得比较粗略，但是，对于教会的反动本质的揭露和批判，却是十分尖刻有力的。

作者在《十日谈》里，采用揶揄的笔法，描绘了一张封建教会的百丑图：这里有生前无恶不作，死后却被神父封为“圣徒”的夏泼

莱托；有昏庸无能，秉性懦弱的塞浦路斯国王；有假装天使愚弄女人的亚伯度神父；有生前穷奢极欲，死后周身打扮得富丽堂皇，手指上戴着价值五百金币以上的红宝石戒指而进入坟墓的大主教斐利浦·米奴托罗……总之，一千多年来，人们视为神圣的、凛凛不可侵犯的人物，在卜迦丘的笔下，一个个都被表现为可笑的丑角。

在作者看来，神父教士们的罪恶不在于他们贪图人世间的享受，而是在于他们的虚伪做作，表里不一，他们表面上摆出一副道貌岸然，超凡脱俗的样子，而背地里却干着男盗女娼的卑鄙勾当。在第九天第二个故事里，作者以辛辣的笔调，嘲弄了一个女修道院长。平常，她在人们的眼里，是一个对上帝十分虔诚，心地“圣洁”的女人。因此，修女们都很敬畏她。有一天晚上，她去修道院的大厅里，声色俱厉地审讯一个因为私自恋爱而违犯清规的年青修女，她决定严办这个罪徒。不料，这个修女突然发现这位威严的女院长头上戴着一条男人的短裤子，于是抓住这一点，反唇相讥，使得这位女院长在众目睽睽之下窘相毕露。原来，当人们叫她起床审理案情的时候，这位“圣洁”的院长正在和一位教士欢会，慌忙之中，竟把教士的裤子当头巾了。《十日谈》通过这些故事，十分尖刻地戳穿了封建教会的说教者们种种虚伪的宣传，无情地暴露了他们隐藏在神圣道袍下的丑恶行径。

在封建社会里，法庭、军队、专署衙门是维护封建制度和反动教权的国家机器，法官、巡警是具体执行宗教法规的凶手。因此，在《十日谈》中，法官、巡警以及其它封建官吏，同样不能幸免被鞭笞、被嘲讽的命运。在作者的笔下，他们不是昏愦愚蠢的庸官，便是凶恶残忍的歹徒，在第六天第五个故事里，作者把一个所谓精通法律的法律家描绘成一个形象相当丑陋，智力十分低下的人物。他“想取笑别人，结果反被别人取笑了

去”。

对于封建法庭，卜迦丘没有象一般作家那样，把它描绘成一个阴森可怕的阎王殿，而是采用戏谑的笔调，把堂堂的法庭变成戏弄法官的场所，用笑声来抽打封建统治者们。在第八天的第五个故事里，作者描写了三个青年市民捉弄法官的情节，谁看了都会哑然失笑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二个青年市民假装争吵，到法庭上请法官评理，而另一个青年则乘机钻到法官的椅子下，机敏地脱下了那个法官的裤子，使法官在众人的面前狼狈不堪。

卜迦丘对教会罪恶和神权政治的揭露和批判，不只是体现在某几句话或某几个故事里，而是贯穿在整个著作之中，形成了这部作品的主旋律。他的这种严肃的批判精神，反映了当时的城市平民阶段，即新兴资本主义摆脱教会的束缚和宗教桎梏的要求和愿望。因此，《十日谈》一经问世，便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自此以后，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在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和僧侣阶级的斗争中，都从《十日谈》中吸取精神力量和创作养料。

《十日谈》的社会意义，还表明在另外一方面，这就是作者针对基督教会所宣扬的神权中心的愚民政策和禁欲主义，大胆地肯定了市民阶层对人生的积极态度，肯定了人有享受现世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并且以高度的热情赞扬了爱情、荣誉、智慧和友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十日谈》比起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过渡时期的代表作家但丁的《神曲》来，的确是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它摆脱了神话的伪装，摈弃了《神曲》里以梦幻形式出现的神秘主义因素，更加彻底地面向现实，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勾勒出一幅幅活生生的人的实际画图。

在中世纪，那些禁欲主义的说教者们把

女人看成祸水，看成邪恶的东西；把男女之间的情爱看作是人性中卑劣的兽性方面的表现。《十日谈》却针锋相对的宣称：女人是美妙的创造物，爱情是人的天性，是一种自然的健康的感情。“在所有的自然的力量中，爱情的力量最不受约束和阻挡”。《十日谈》在第五天和第四天的许多故事里，运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恋人们如何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如何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如何克服封建等级的重重阻碍，最后终成眷属，胜利地品尝到了爱情的美果的故事。同时，作者在有的故事里还描写了青年男女们爱情的悲剧，作者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十日谈》中有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亲王的女儿偷偷地爱上了一个出身低微的青年仆人。这在中世纪等级制度森严的情况下，显然是大逆不道的，必然会遭到封建统治者的反对和迫害。事情正是如此。亲王发觉他们的隐情之后，便杀死了青年仆人，并把他的心脏取出来交给公主。公主见了情人的心脏，一边伤心地流着眼泪，一边狂热地亲吻那颗心，最后吞下了毒药，含恨死去。临死之前，她请求国王把她和她情人的遗体合葬在一处。作者就是通过这些感人至深的情节，在人们心灵的琴弦上弹奏深沉而悲烈的旋律，引起人们对这种纯真的爱情的赞美，对扼杀青年男女爱情和生命的封建统治者的仇恨。

现实生活证明：在爱情这个问题上，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的人们往往显示出忠诚、纯洁和美好的德性，而那些自鸣清高的神父、僧侣们则往往表现出动物般的兽性。对于前者，卜迦丘总是使他们作为正面人物形象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对于后者，作者则让他们成为情场上的倒霉蛋：有时叫他们破费一笔钱财，有时叫他们的皮肉吃尽苦头，有时又叫他们的愿望象肥皂泡一样破灭。

此外，作者对那些单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滥施“爱情”的人也是十分憎恨的。作者通过第八天讲故事人妮菲尔之口表明了这一

观点。“……我主张，女人因为贪图金钱而和人通奸，应该受到火刑的处罚。如果她因抵抗不了爱情的伟大力量，而失身相从，那么假使让一个不太严厉的法官判决起来，她是应该得到赦免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为钱而通奸和为情而相爱的态度是泾渭分明的。

宣扬人的平等观念是卜迦丘人文主义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对于在法律上直接宣布了封建等级制度和教阶制度的封建社会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在《十日谈》中，这一思想内容也往往是通过对爱情的叙写体现出来。让我们听听一位封建制度的叛逆女性的慷慨陈词吧！当国王唐克烈咒骂公主的情人是一个“下贱的奴仆”时，公主为自己的情人辩护道：“你应该知道，我们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我们的灵魂都是天主赐给的，具备着同等的机能和一样的效用。我们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只要你不存偏见，下一个判断，那么你准会承认，最高贵的是他，而你那班朝贵都只能是鄙夫而已。”作者通过这些鞭辟入里的激愤之词，发出了“人人平等”的呐喊，翻了“上贵下贱”这种封建偏见的旧案，赋予“贵”和“贱”以新的含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作者民主思想的亮光。不过，这里所谓的“平等”，只是抽象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平等对资本占有者来说，是确实的；而对无产者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

卜迦丘在“人类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口号下，对于男女之间的平等似乎特别重视，这种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许多故事里可以看得出来。第六天第七个故事里，写了某个城市有一条苛刻的法律：凡是男女奸情案，女方均处以火刑。有个名叫菲莉芭的妇女在法庭上公开指责这条法律不公平，迫使法官更改了这条法律。作者还写了许多女人奚落男

人的故事，虽然有些过分，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是对男尊女卑反动伦理观念的大胆否定，这在那个妇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封建时代，是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思想的进步意义的。

在中世纪，封建教会极力宣扬上帝是主宰一切的，是万能的，而人则是渺小的，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人在上帝、神权的面前，只能俯首贴耳，任其摆布。卜迦丘却借助《十日谈》中他所塑造的理想人物，与这种宗教邪说分庭抗礼。书中，他刻画了一系列身心健康、聪明能干的正面人物形象，他满腔热情地颂扬了他们伟大的精神力量，高超的智慧和真挚的友谊，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在这些理想人物的画廊里面，有巧施妙计，捉弄国王的马夫；有医道高明，治好法国国王不治之症的女医生；有随机应变逃脱主人惩罚的理论学者……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藐视上帝，不信神道，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充沛的精力去博取现世生活中的幸福与欢乐。一句话，他们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物。

《十日谈》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它深刻的社会意义，而且在艺术技巧上，较之以前的作品，亦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结构上的完整严谨，是这部著作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书中，虽然洋洋洒洒地记述了一百个短篇故事，但是作者匠心独运，他采用了十个青年讲故事的巧妙方式，将这些故事自然地连缀成篇，使之构出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其次，作者摒弃了中世纪教会文学中那种呆板的、象征的、虚幻的艺术方法，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来刻划人物形象，描绘自然风光，使作品显得生气勃勃，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同时，作者还善于运用色彩多变的笔锋去描绘大的场面。比如，在这部小说的开头作者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极其巧妙地调配着颜色，他先用一种灰暗的色彩描绘了佛罗伦斯瘟疫流行的可怕

场面。接着，他将笔头上的旧色褪去，换上一种明郎鲜亮的色调，描写了十个青年男女在美丽的别墅里唱歌跳舞的欢乐情景。前后两个场景一暗一明、一悲一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寓意是十分深刻的。此外，作品中的语言形象生动、自然流畅，并且吸收了许多民间的俚语、俗语，因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总之，《十日谈》这部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文学著作，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短篇小说的体裁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都开了一代先河，在欧洲文学史上，不愧为一块现实主义的艺术瑰宝。

但是，“在资产阶级文化的遗产里，蜜糖和毒药是紧紧混合在一起的。”<sup>③</sup>勿庸讳言，从《十日谈》中也包含了许多资产阶级的糟粕和毒素，我们今天阅读这部作品的时候，必须加以批判和剔除。例如，作者在肯定人的现世幸福生活的同时，却大力宣扬追求个人享乐可以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主义；在批判禁欲主义，歌颂爱情自由的同时，却又过分地夸大了爱情的作用和力量，而且有些地方的色情描写未免猥亵过甚，流露出市民阶层对纵欲的欣赏。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有的故事里（例如第十天的最后一个故事），进行道德说教，宣扬顺从，宽容这种中世纪的道德观念，这就在《十日谈》昂扬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基调上，掺进了一点极不协调的低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以及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所固有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我们就其反封建、反教会的主导方面来看，它的历史进步作用，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①茅盾：《世界文学名著讲话》，第1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

③高尔基：《论文化》